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田彤
编

陈序经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田彤
编

陈序经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陈序经卷/田彤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300-19902-3

I. ①中… II. ①田…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②陈序经 (1903~1967) -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0969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陈序经卷

田彤编

Chen Xujing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36.7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91 000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 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他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导言：社会历史的文化阐释

在近代学术与思想的谱系中，陈序经是一位中西兼通的大师级学者。

陈序经祖辈世居海南文昌县清澜港瑶岛村，家族中颇多南洋华侨。其父陈继美长期客居南洋经商，经营种植园。陈序经1903年9月1日出生，4岁入私塾启蒙，7岁随父赴新加坡读书，10岁返乡先后入读文昌汪洋致远小学、文昌县模范小学。1915年随父居新加坡，就读育英、道南、养正等学校及华侨中学。其父不愿子弟长期接受殖民教育，1919年底遣陈序经归国。翌年插班四年制广州岭南中学初中三年级。1922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因不愿入基督教，1924年转学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就学期间，陈序经已展露学术潜力，1925年在校刊《复旦》发表论文《进化的程序》、《贫穷的研究》。生物进化论、社会进化论，即由此开始或明或隐地影响其一生的学术与思想旨趣。同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按其父意愿留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政治学、社会学。越明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28年完成学位论文《主权可分论》，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受聘于岭南大学社会学系。1929年再赴德国柏林大学研习政治学、主权论、社会学，次年在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院研修。期间，参加由柏林高商学校举办的德国社会学第7次会议。1931年因病返国，继回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讲授过中国政治思想史，曾在中山大学、神学院分别开设政治学、中国文化史。发表《东西文化观》一文，借用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等基本理论，明确提出“全盘西化”论。1934年转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兼商学院教授，开设社会学、乡村社会学；并策划工业发展对社会的影响的调查。研究重点在文化选择、蛋民研究、乡村建设运动、南洋问题诸方面。1937年8月因日侵

华转赴长沙筹建临时大学。1938年执教西南联大，任法商学院院长，主讲主权论、现代政治学、社会学原理、文化学、华侨问题；并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兴趣包括南洋、西化、教育、地方文化、乡村建设等问题，完成20册的“文化论丛”。1944年6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访学一年，1945年1月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1946年8月南开大学复校，任教务长、经济研究所所长、政治经济学院院长，被张伯苓倚为“左右手”。是年有关查民、乡村建设的论文，分别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大东书局结集出版。1948年校长张伯苓长考试院，南开大学组织校务委员会处理校务，陈序经为委员。同年岭南大学美国基金会鉴于陈氏的教育思想、行政能力、学术地位及广泛的社会关系，特聘陈氏接替原校长李应林，8月出任岭南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一年后接替李应林出任校长，重组医学院，建立商学院。在国民党实施“抢运学人”计划时，劝服大批知名学者留校，拒绝岭大迁港，并动员留美的西南联大学生到岭大任教。这一时期除延续原有学术兴趣外，尤为关注宪政，呼吁扶植工商业发展。出版《越南问题》、《大学教育论文集》等专论。1952年院系调整，岭大并入中山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筹建东南亚研究室。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50年代重点研究民族史，完成《匈奴史稿》、有关东南亚古史研究系列论著，撰写《泐史漫笔——西双版纳历史释补》。1962年兼任暨南大学校长。1964年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序经历任广东省文教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届广东省政协常委及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中以“反动学术权威”、“里通外国”、“美帝文化特务”、“国际间谍”等“罪名”，被迫接受专案审查。1967年蒙冤离世，1979年始获平反，恢复名誉。

陈序经知识博洽，学养深厚，思想独到，视野宏阔，论域广涉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历史学、教育学。其学术大多并非仅“为学问而学问”，内中条贯毫不妥协的“慷慨国事”的“儒侠”哲思。学术的动力、终极关怀源自其思想，思想的升华得益于其学术实践。学术与思想融通一体，而社会进化论、民主平权观念又是两者的基础与核心。

陈序经的知识结构主要为社会学与人类学。陈序经自幼至18岁前侨居新加坡，备感“洋人”统治的殖民地比国内“有条有理”，开始了对社会问题的最初思考。20岁后学于沪上，华洋两界的反差、下层民

众的困难，刺激陈序经从学理上探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贫穷的根源。由于先修生物学，再转社会学，他既洞悉生物进化论与社会进化论的本质区别，又强调两者的共性。在《进化的程序》中，陈序经认为：“进化论的价值，就在乎主张世界在时间上的秩序与空间上的秩序一样。”揭示从自然环境到人类社会，都在“有秩序地变”。在他看来，自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叶，“进化论发达的程序”，先天文，次地质，次生物，终至社会。而人类进化程序即由“人类的原始”、“人类个体进化”，到“人类社会进化”（内分“野蛮时代”、农业发达的“半开化时代”、工艺发达的“文明时代”）。他始终坚信，正如“高等的生物，是由下等生物变成的；文明的社会，是由从前的野蛮的社会变来的”。此后无论陈序经学术思想如何豹变，这种线性进化论，规范着其历史观与认识论。

陈序经以为“贫穷是人类的苦难”，“贫穷是一切社会病态现象中最根本的原因”。接触社会学之初，他即开始试图解析人类社会贫穷的原由。征诸西方学说、中国现实状况，陈序经指出社会贫穷根源于：个人性格、习惯、教育程度、立法司法缺陷、赋税苛重、阶级上相压制、工价低廉、职业不稳定等。对中国而言，“很重要的原因”是天灾、战争。陈序经注重社会、职业分层，疏于对社会结构、功能分析，因此他对于“除贫的根本方法，只好候诸社会学专家去研究”。

入读伊利诺伊大学，问学于著名社会学家海夷史（Edward C. Hayes）教授，接受海氏主张从因果关系、社会生活的统一、心理、伦理的角度切入社会的研究法则，由此毕生注重社会变迁的因果关系、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文化不可分论，视伦理为文化层累的最后阶段，乃至践行社会调查，积极讨论社会问题、教育问题。陈序经不宗社会学的一派、一脉，但对孔德较为推崇。在他看来，“社会学之所以能够发生，是由于人们能够感觉到经验是有连带的关系的，是整个的”。35岁时，陈序经发表《社会学的起源》一文，全面总结欧美社会学发展史，指出孔德不是社会学唯一创始者，但接受孔德的“静的社会学”、“动的社会学”，既重视社会组织与秩序，又重视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研究，并力图将社会学从哲学特别是历史哲学中抽离出来，建立有别于自然科学的“实证”的社会学。正因如此，他在1948年中国社会学社广东分社第九届年会上，仍呼吁以西南社会为始基建立富于中国国情、民性的社会学。

陈序经最有争议而引领东西文化论争潮头的学术思想，无疑是

1930年代提出的“全盘西化”论。因华洋生活经验，陈序经怀疑中国文化，“感到西化的必要”。1928年发表《再开张的孔家店》，表面抨击孔祥熙提议保护孔林、孔庙，实质却指出“全盘西化”的必要性。1930年发表《孔夫子与孙先生》，借助在新文化中遭声讨的孔子，质疑孙中山承袭孔子之道德、同情其政治理念而“全盘效法”西方物质文明的“中体西用”的合理性。1931年在《东西文化观》中，批驳复古派、折衷派，正式提出“全盘西化”论。1934年发表《中国文化之出路》后，引发广东地区中西文化论战。1934年年底《文化建设》月刊也开始关注这场论战。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五四以来的又一次中西文化大论战由此而生。陈序经一面应战张馨、吴景超异议，一面发表《再谈“全盘西化”》，不顾胡适、张佛泉的同情论调，将其列为折衷派，毫不妥协地主张目标与结果的“全盘西化”。在《从西化问题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信仰》、《读十教授〈我们的总答复〉后》中，强调尽管在文化是否可分等方面难达共识，但吴景超、张佛泉、胡适等已承认全盘西化的“趋向”，王新命等也骨子里“已经有意或无意地趋在这条路上”，“全盘西化”论稳操胜券。1935年、1936年分别发表《南北文化观》、《东西文化观》，深化《中国文化之出路》的主题。同时，再发《全盘西化的辩护》，反对胡适、严暨澄、张东荪等以“充分”、“尽量”代替“全盘”，以“现代化”、“世界化”代替“西化”的主张。1936年，发表《一年来国人对于西化态度的变化》一文，回顾1935年来文化讨论的社会背景与论点，指出：除前述“同情或趋于全盘西化论者”外，尚有沈昌晔、区少干、郑昕等；近于或赞成全盘西化论者“占了优势”，复古派也是“死老虎”，折衷派“很少有人相信”。

抗战时期张申府、冯友兰、贺麟以哲学观点解释“西化”，陈序经本着“全盘西化”可以“持久抵抗”敌人、建设“强有力的国家”的主旨，1941年在《抗战时期的西化问题》一文中与前者“分合”、“共殊”、“体用”观相辨析，指出三者实质已“说出全盘西化的理由，已偏于全盘西化的主张”。同时，在《广东与中国》（1941年）、《南方与所谓固有文化》（1946年）、《南方与西化经济的发展》（1946年）、《研究西南文化的意义》（1948年）诸文中，继续发挥《南北文化观》之主旨，倡导西南承继西化传统而为现实“全盘西化”的先导，进而复兴中国。

陈氏“全盘西化”论，绝非率尔操觚之论，而有其内在文化学理论支撑。留美时，常用“文化学”一词，或谈论其含义。1928年将“文化学”带入岭南大学，且认为“文化学是自有其对象，自有其题材的一种学问”。留德时，有意搜求文化学材料。此后10年，因兴趣、工作需要，他主要开展社会学、政治学、工业调查等研究。这期间虽未专注文化学理论的阐释，但所发表的有关文化论战言论均以西方文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时境观”、“文化圈围”、“文化不可分论”、“一致与和谐”、“文化重心”、“文化弹性”为根基。抗战全面爆发后，因资料散失、调查区域为日军占领，陈氏主权观念、社会调查工作被迫中辍，其研究重心转向文化学。自1938年下半年始，在西南联大主讲文化学，编拟文化学系统大纲。陈氏在1940年秋至1942年秋两年中全力写作，终于完成200余万字、20册的“文化论丛”。除《文化学概观》4册公开出版外，余者《西洋文化观》2册、《美国文化观》1册、《东方文化观》1册、《中国文化观》1册、《中国西化观》2册、《东方文化观》6册、《南北文化观》3册均未发表。《文化学概观》系统阐述文化学的主要概念、基本理论，其他部分都为文化学体系提供历史经验，并且尝试文化学理论的应用。1946年陈氏发表《我怎样研究文化学》一文，自述构建文化学的内在动因及其体系的设想。

陈氏文化学自成体系，且独具实践性，即一方面文化学得益于实证研究，另一方面文化学也为具体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两方面相得益彰。这种特性不仅体现在陈氏文化观中，而且体现在其教育、乡村建设、政治、蛋民、南洋等方面的研究中。

1932年5月19日，广州教育专家召开会议，决议“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同时多设职业学校”，陈氏发表《对于现代大学教育方针的商榷》，以“大学的目的是求知”予以反对，并指出文、法科也有实际功用。此次广州教育方针出台，受到4月间来粤游历的美国哥伦比亚教育学院勒克教授的某些影响。为消除其负面影响，陈氏发表《对于勒克教授(H. Rugg)莅粤的回忆与感想》，指出勒克不了解中国有关状况，仅通过对中国名流调查即断定中国需要部分的西化，其非科学的统计方法只能产生错误的结论。文化的改造既然错误，其教育的改造也不免错误。何况勒氏是从事“大学以下教育的人”，根本不懂大学教育原理。5月31日天津《大公报》刊载陈果夫在中政会提出的改革教育的初步方案。陈果夫明确提出暂行停办文、法科十年。到7月下旬，有关

讨论文章在《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栏即刊出十余篇，且延及北方。蒋廷黻、刘廷芳支持陈氏观点，另有论者对陈氏加以指摘。陈氏发表《敬答对于拙作〈对于现代大学教育方针的商榷〉之言论》，批评对立派不了解大学教育本质，更提出“20世纪世界，好多重要的世界问题，已变成中国的问题了；同时，好多重要的中国问题，也成了世界的问题”。中国教育也需学习西方，发展真正的大学教育。陈氏还主张教育宗旨的现代化。1933年2月徐旭生发表《教育罪言》，以为现行教育制度与社会“完全不适合”，“由无限农村组成的中国，应该创造出来一种农村的教育”。1933年陈氏再发《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指出：主张教育“中国化”者，以为西方教育不合中国国情，而国情也非一成不变，“现代化的国情是现代的环境，并非中国所独有”；如果要想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停止所谓教育的“中国化”的复古运动，彻底采纳西洋教育。

接继教育的中国化与现代化论争，1940年大学教育方针及计划论战再起。抗战胜利后，大学复员中，教育部将南开大学等私立学校改为国立，陈氏发表《论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指出：政府应补贴办学成绩较好的私立大学，同时保留国立、私立大学制度，以保持各种办学风格。强调教育当局从教育方针、院系设置、课程编制，到校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的委任等行政干预，根本上是“反于大学教育的目的”。1947年9月胡适发表教育十年计划谈话，略谓：取消留学派遣，政府以此经费，在五年内重点培植北大、清华、浙大、武大、中央大学等5校。以为以大量外汇供学生“镀金之用”，“等于不承认自己学术独立”。陈氏发表《与胡适之先生论教育》首先问难，认为胡适选定5所大学的标准是凭“偏私”，极力维护留学政策。胡适再发表《争取学术独立十年计划》一文申说。一时间平津地区学者纷纷加入讨论。陈氏在论战中稍处弱势，又发表《公论耶？私论耶？》、《论发展学术的计划》，指出：学阀意见非“公论”，即使胡适计划得到蒋主席、教育部朱家骅部长的赞同，也不能谓为“社会的公论”，只能称为“政府的言论”。而“专仰政府的鼻息，以讲学求独立”，“是一个致命伤”。并且反对胡适“学术独立”说，指出在“学术水准很为落后的时间之下”，应将“独立”改为“并立”，即“与欧美的学术并驾齐驱，或是进一步地去驾而上之”，并重申应鼓励各校发展自身特色与学科优长。要实现“学术独立”，大学需要引进有真学识人才，且更需要无私心、学品高尚、能以

教育为终生事业的领袖负责教育行政机构。

陈序经运用文化学理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引发乡村建设运动的集中讨论。乡村建设运动于1926年展开，到1936年告一段落。内中约有一千余政府、民间团体及一万余农学会，在北到河北、南至广东、西到四川、东至浙江的广大范围内，进行从理论到实践的探讨和实验。尽管轰动有时，但乡村建设运动几乎全军覆没。与之相伴，反对之声从未停止过。1934年梁漱溟在定县召开的乡建工作讨论会上，主张融合西洋都市文明（工业文明）与中国乡村文明（农业文明）而成一新文明，实现中国民族自救。陈氏撰文《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指出：西洋文化既不只是都市文化，中国文化也非只是乡村文化。作为现代西洋文化特质的科学与民治，“差不多完全是都市的产物”。西方都市的发展，差不多就是乡村的发展。反之，中国乡村文化，造成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停滞。乡建的目的其实就是西洋化，但用中国乡村文化调和西洋都市文化则根本行不通。1936年陈序经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表示对乡建前途“颇感觉悲观”。他指出：乡村建设“工作与好像都不能名实相符”，还未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对于乡村，对于农民，精神方面固少有建树，物质方面更少有改造”；乡村建设“目标是救济乡村农民”，而乡村建设却“养出”“思想浮躁”、未能真正深入农村、“吃乡建的新阶级”。此文发表触发“众愤”，《独立评论》、《民间》半月刊、《文化与教育》旬刊、《政问周刊》均发文，告劝陈序经不要再给乡村建设泼冷水、迷惑青年人的“心思”，而应予以善意的鼓舞。陈氏发表一系列文章，回应批评。在《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中，坚持文化进步说，指斥乡村建设者违背文化演进趋势，恢复以农村为代表的业已毁损的传统文化，是不折不扣的文化复古论；并指出乡村建设领袖提倡新教育、新科技与新知识，其本身即说明复古终无前途。在《乡村建设运动的史略与模式》中，全面回顾近十年乡村建设工作，总结出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定县中华平民会与青岛市政府乡村建设三种模式，并指出青岛模式的成效远高于邹平、定县模式的原因，即在其乡村建设工作以都市为依托，内中体现文化中心论。在《乡村建设运动的组织与方法的商榷》中指出：乡村建设组织“数目过多、发展之速”，却缺乏联络、遇事推诿、经费支绌，因而难免失败；因都市是人才、经济的重心，乡村建设工作应在都市附近开展。1943年年底陈序经又发表《乡村建设的途径》，再次总结乡村建设衰败之主要原因，在于以农为

本，反对工业化；进而提出乡村建设应以工业为前提，以都市为起点。

陈序经崇尚人格独立。留美之时，陈序经已经具备扎实的社会学的功底。其博士论文《主权可分论》虽然主要是从政治学角度探讨“主权可分论”的变迁过程，但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勾勒出君主、近代国家、民众、介于近代国家与民众间的社会组织等阶层相互扭结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一复杂关系的历史走向。在具体论述方面，注重从人的社会属性上，分析人与主权的关系；还把主权分为个体主权与由个体委托的社会组织主权。研究对象往往影响研究者的价值取向。主权可分论所内含的民主精神，逐渐成为陈序经的文化选择与政治选择立场，及其政治底线。对他而言，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创造力的源泉、社会进步的尺度；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确立过程，也就是西方文化发展的过程。从整个欧洲文明来看，中世纪文化之所以停滞，就是因为个性受到压制；反之，西洋近代文化之所以快速发展，主要是由于个性的张扬与个人主义的提倡。同理，中国文化两千年来的单调、停滞的原因，是在孔家思想禁锢下，个性不能高张，个人主义无从发育。陈序经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强调，全盘西化就是打破中国传统思想的垄断，给个性以发展的可能。对陈序经而言，直至清末，先秦政治哲学一直统摄中国政治、社会生活，导致中国处于“黑暗时期”。因此，他在《春秋战国政治哲学的背景》中，从理论上阐释传统政治架构中的“非人性”。即一方面指出先秦政治哲学是其时的地理、家庭、道德、宗教、经济、政治、战争、教育诸因素的产物，从诸多方面剥夺民众的生存权；另一方面则强调社会政治背景更是政治哲学的表现，呼唤新的合乎时代要求的政治哲学理念的产生。1935年发表《利玛窦的政治思想》，指出：利氏在中国广布宗教与科学，但他同样竭尽全力宣传政治思想。利氏生存的时代，是皇权挑战神权、人权挑战皇权的时代，因而主张人民主权、反对君主专制。他到中国后，不仅反对佛、老，而且极力反对孔子，怀疑儒家。他主张世界主义、人类平等、男女平等，鄙视政治，反对家族主义，希望国家内部“各种人民分工合作”，“和谐”共生。女权是人权的集中反映。1942年陈序经又专论《中国妇女运动过去与将来》，指出：妇女运动是欧洲19世纪到20世纪的社会运动的主流之一，与民族运动、民主运动、工业运动密切关联，而形成近代文化的特性。虽然中国女权渐兴，但社会应给妇女更多的就业、参政等自由与“机会的平等”。在戊戌维新运动46周年时，发表《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肯定该运动